

年、2015年和2018年的修改,但其体系整体并未改变,历次均为部分修改;党的纪律检查机构、机构权限等自成立至今也没有结构性改变。针对公权力使用者的监察,在国家制度内,经历了行政监察和国家监察两个时期,其变迁的结果是提升了监察权威,使得反腐败力量增强,反腐败预期提高,这都保证了党和国家纪律处分体系在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稳定,这充分展现了党和国家处分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制度自信”。第八,处分官员与机关严格遵守纪律规范,并与处分对象同样接受处分。“这是合法原则中最复杂、最关键的要求”。^[23]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是检验处分体系成功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历次全会上一再强调要解决‘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要求纪检监察机关‘清理好门户’,防止‘灯下黑’。”^[24]党和国家在纪律检查和处分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制度设计。在纪检监察外部,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监督是最正当的监督力量,通过监察委员会专项报告对其处分职权进行监督;在内部,不仅成立干部监督室,专责对内监督,而且,在工作流程上,将监督检查与日常管理相对分离,将调查与审理相分离,实现内部相互制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N]. 光明日报, 2022-01-19(01).
 [2]钟宪章. 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的历程与经验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7(4): 40-46.
 [3]王宏哲. 纪律性党规的外在规范性: 标准与法典化[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0(5): 29-34.
 [4]唐皇凤, 杨洁. 中国共产党百年纪检监察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与基本经验[J]. 治理研究, 2021(4): 28-37.
 [5]向杨.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领导体制的演变历程、特征及启示[J]. 社会主义研究, 2018(5): 77-85.
 [6]黄晓辉. 推动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的思考[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4(6): 101-104.
 [7]王迎龙. 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机制若干问题之探讨——以〈国家监察法(草案)〉为分析蓝本[J].

湖北社会科学, 2017(12): 126-136.
 [8]刘俊生. 公务员惩戒权设定——五国经验及其解释[J]. 南京社会科学, 2007(5): 68-72.
 [9]李建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说明[EB/OL]. 中国人大网, (2018-03-14) [2022-02-07].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8-03/14/content_2048551.htm.
 [10]吴玉良.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的说明[EB/OL]. 中国人大网, (2020-06-20) [2022-02-07].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bbd27f60abcc4982aa8bc051cb86b633.shtml>.
 [11]肖培. 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N]. 人民日报, 2018-03-18(10).
 [12]刘明. 纪律建构与政党现代化[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7(8): 30-34.
 [13]杨晓渡. 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J]. 党建研究, 2019, (11): 15-18, 35.
 [14]杜昕怡, 肖泽晟. 任免机关、单位处分的法律规制研究——基于二元处分体制的语境[J]. 湖湘论坛, 2021(4): 85-96.
 [15]任巧. 论对行政公务员的行政处分和政务处分双轨机制之间的调适[J]. 重庆社会科学, 2019(12): 57-67.
 [16]任建明, 洪宇.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素、结构与发展[J]. 廉政学研究, 2018(1): 24-43.
 [17]朱福惠. 国家监察法对公职人员纪律处分体制的重构[J]. 行政法学研究, 2018(4): 24-37.
 [18]刘怡达. 论纪检监察权的二元属性及其党规国法共治[J]. 社会主义研究, 2019(1): 79-86.
 [19]王冠, 任建明. 纪检监察体制变迁中的多元主体关系及演进逻辑[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63-75.
 [20]聂鑫. 民国时期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体制研究[J]. 法学研究, 2016(3): 193-207.
 [21]常瑞. 从惩戒腐败历史经验看严明党的纪律[J]. 前进, 2015(11): 26-27.
 [22]刘艳红, 刘浩. 政务处分法对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化推进[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5-19.
 [23]管从进. 基于法律内在性的法治标准新探[J]. 法学论坛, 2017(1): 107-119.
 [24]张翔. 对“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制度回应[J]. 中国纪检监察, 2019(3): 38.

【责任编辑 刘绚兮】

(下转第115页)

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合作*

伍一达¹ 丁焕峰²

(1.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 澳门 999078; 2.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00)

[摘要] 中央提出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提炼和升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也给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合作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没有合作就没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之间多年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尤其在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转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过分依赖出口导向型战略容易引起发展动能减弱。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经济实力看,粤港澳大湾区理当成为全国践行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样板地和试验田,其中大湾区内三地之间的贸易合作更应该大力推进,方能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环境下率先突围,并带动全国经济增长。基于此,在模拟分析区域之间贸易合作经济效应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总结了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合作进程及现状,进而实证检验了湾区内贸易合作的经济促进效应。研究发现:内部贸易增长率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为正;政府支出对大湾区经济增长系数为正,但是不明显;汇率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影响。本文最后提出统筹大湾区内外贸易关系、大力发展湾区内贸易、以科技创新提升内循环、优化湾区内贸易结构、加快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等方面来进一步推进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双循环 粤港澳大湾区 贸易合作 效应检验

[中图分类号] F1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2)03-0017-10

一、引言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国际形势变得极其复杂,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多。尤其是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全球经济形势下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外部压力骤增、中美关系恶化、地缘政治摩擦频出等变数。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

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提出主要源于当今世界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甚至有部分国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经济战”等,对中国实施“断供”,以及所谓的“脱钩”“去中国化”等,这使得我国产业链存在断供风险,国际贸易不畅。应该说,党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准确判断,是针对我国未来几十年长远战略规划做出的正确科

收稿日期: 2021-09-07; 修回日期: 2022-03-30

*基金项目: 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进程中财政资源横向配置机制构建”(2016WZDXM03);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知识异质性、创新集聚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功能分工研究”(2019A1515012099)

作者简介: 伍一达,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国际经济管理研究; 丁焕峰,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

学反应,兼顾了我国经济发展短期、中期和长期战略布局需要。

可以预见,双循环发展格局完全符合贸易强国建设的战略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其本质就是要求国内区域之间加强贸易合作,在共御风险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目前国内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贸易合作市场。这些跨省市的区域市场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影响巨大,是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的贸易强国战略载体。在这其中,环渤海的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等必将在未来双循环战略实施中发挥重大引领和实验作用。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早就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其立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需求和实力,三地之间的贸易合作应该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典范。实质上,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是将港澳世界级优势和珠三角地区发展动能的强势结合起来,打造全球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从这个角度讲,双循环格局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出口导向型战略进行的有效修正和调整,有利于促进湾区经济深度一体化发展。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形势决定了必须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徐奇渊从国际大循环面临的挑战、双循环格局是如何提出的、对外开放在双循环格局背景下的定位和含义、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渠道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双循环格局是我国经济突围的必然途径^[1]。刘元春认为“内循环”是满足国内各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李源从基于多维角度挖掘了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经济学逻辑^[3]。汤铎铎认为经济“内循环”动力来自本国贸易格局^[4]。陆岷峰认为经济内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二者不能割裂开来^[5]。

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全面解读。戴翔、张二

震认为双循环是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循环畅通,大循环的主体是畅通产业链^[6]。刘志彪认为双循环必须要优化全产业链协调发展,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最根本是要“补短板”^[7]。吕秀彬认为双循环更要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适配性,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经济运行成本^[8]。倪月菊总结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规律之后,发现在发展到达一定阶段后,都会逐步从以国际循环为主转变为以国内需求为主的模式^[9]。另外,王洪涛、陆铭坚持认为内循环并不是对外循环的否定,双循环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在国际大循环中发展国内经济实力^[10]。

双循环发展格局下贸易方式必然发生变化。刘伟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空间受到挤压,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受到弱化,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对过去依赖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赶超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11]。李鹏基于主要发达国家的赶超经验,坚持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是实现经济追赶的最终手段^[12]。沈坤荣、赵倩坚持双循环是从“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向“以内为主、内外互促”的贸易格局,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13]。

双循环格局下,必须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合作。关于这一问题,理论界主要开展了两个层面的研究。其一是关于区域合作的研究。汪伟全通过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合作的研究发现,区域协同发展应强调慢变量支配原则和序参量决定原则,否则难以持续^[14]。许鲁光^[14]坚持深港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牛鼻子”,应该提升到战略层面,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深度合作,才能获得先行先试的制度红利。毛艳华、杨思维发现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与港澳台的地缘关系越发呈现强竞争态势^[15]。杨英强调重视区域内规划、监管治理及合作开发机制的构建,建议提供覆盖不同制度区域的公共服务^[16]。黄

丽华认为广东省9个城市应该参照旧金山湾区,协调好湾区城市合作分工^[17]。

其二是关于大湾区贸易合作研究。宋周莺等通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地位和其区域内贸易关系发现要联合三地拥有的贸易优势,推动商品贸易发展多样性,提高区域内贸易在贸易中的占比^[18]。袁持平、刘洋从区域一体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出发,分析贸易整合在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建立过程中的经济效应以及优化路径^[19]。封小云通过分析粤港澳三地之间要素流动的发展趋势发现粤港澳贸易合作的特点是以服务贸易合作为主^[20]。李郁、李彦等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往来的梳理,认为在全球格局和国家战略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拓展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合作^[21-22]。

三、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对贸易影响解析

(一) 双循环经济理论及实践

斯密经济学范式和马歇尔经济学范式均指出了大国经济发展具有规模性、多元性和内生性的特征。其中,在以专业化分工和自由交换为理论基础的背景下,斯密经济学范式强调大国具有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为专业化生产和市场分工提供了有利条件,采取扩大国内市场容量的措施基础上降低生产成本。

马歇尔经济学范式则更多地强调大国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市场需求等方面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其完全可以独立于或外生于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在经济危机或遭遇经济封锁的特殊历史时期,可以借助其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结构,提供了多层次消费市场和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完全可以借助庞大的国内市场加速经济独立循环。

无论哪种范式,其坚持国内和国际循环构成了一种互补和替代的关系。在相对有限的国内和市场空间条件下,太多依赖于特定水平的

出口市场可能会抑制国内的需求。而内循环能进一步扩大内需,释放内需动力,可以弥补外需波动的不足,减少外需波动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

世界经济史上,也曾有过非常成功的经济双循环实践。自从美国对日本贸易出现巨大逆差之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长期且严苛的贸易制裁。由于对美国市场过度依赖,日本单纯外循环主导的经济模式难以持续。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86年制定通过《前川报告》将经济发展战略从依靠美国的出口主导转变为依靠国内市场的内循环转变,致力于摆脱对出口过分依赖的现状,通过大力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摆脱了“滞胀”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这其中,日本政府积极发展城市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将首都圈划分为东京大城市圈和周边地区,强调要重新构筑“多核多圈型”的区域结构,推动部分政府机构从东京市中心转移出去,进行重新配置。可以说,日本为中国推动双循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双循环经济格局理论和国际实践给我们如下政策启示:一是不论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国内;二是大国必须以内需为主,不能片面追求对外开放度;三是必须形成国内统一市场,不能自我分割;四是无论内循环还是外循环,成败关键是贸易竞争力的高低,尤其是要提高关键技术、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抗冲击的韧性。

(二) 双循环格局贸易效应及其假设分析

双循环格局有助于提升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双循环背景下,结合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进一步补充和扩展产业链,形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从而提升产业链的质量与水平。

就贸易效应而言,双循环可以从三个方面产生影响。从供给上,随着全球贸易由于“交易成本”上升的情境下,降级国内贸易成本,强化国内关键领域产业链。这个时候,完全可以从容建设创新为主、协同发展的独立产业体系,摆

脱对某一国家和某一地区的贸易高度依赖,打造属于自己贸易市场的独立供应链。从需求上,当部分外需市场收缩,甚至出现“卡脖子”“断供”压力的背景下,必须实施贸易备胎战略。形如中国那样的巨大经济体,其大国的市场优势就是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居民购买力是

国内贸易的核心,进而推进经济增长。从市场规模上,通过共同富裕、收入调节等措施,扩大内需,依靠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完整工业体系的供给能力,支撑内循环之余高竞争力参与国际市场,提高贸易竞争力。就我国双循环而言,其运行路径及其效应传导机制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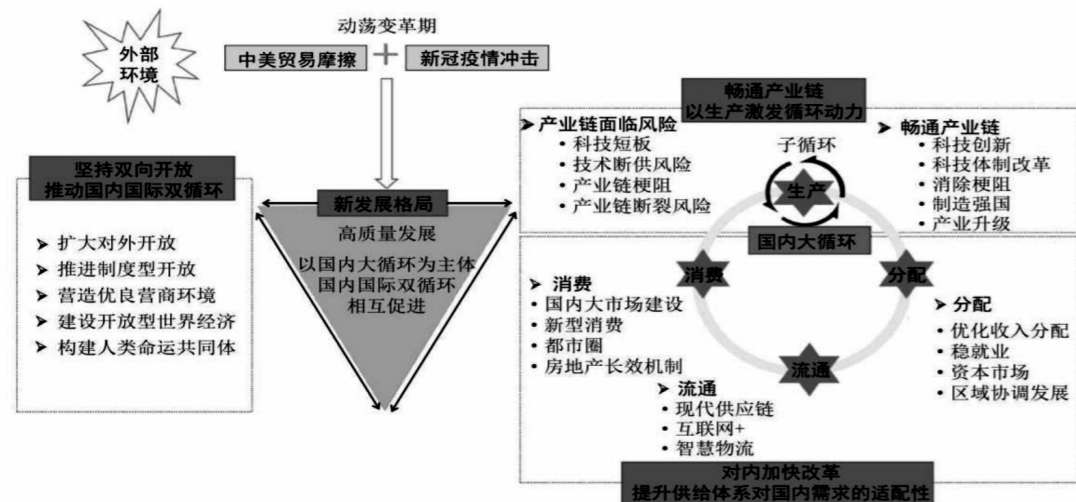


图1 双循环运行效应及传导机制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进一步探讨双循环效应的几点假设。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扩大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内需是双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双循环最核心的环节。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指出,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此同时,双循环经济格局的核心是要冲出封锁,必须要加强科技创新,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培育产业链国际竞争优势,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为此,必须要紧扣构建高质量科技供给体系,确立政府投入主体的地位,稳步推进以新技术为载体的“新基建”建设投入。可见,无论扩大内需还是技术创新及“新基建”投入,无不需要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经济落后地方尤为突出。

假设1: 双循环格局下,为了实现经济突围和技术突围,需要扩大政府财政支出。

双循环格局下焕发内需潜能必须要“降低

成本”。惟其如此,方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要素、商品实现自由流通。目前,国内大循环遇到了各种梗阻,循环并不畅通。这其中减税降费等政策落地梗阻,企业减负效果不明显。尤其是,周边国家大幅减税让利,着力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势头迅猛。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所缴纳的总税率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九大样本国家相比仍旧最高。近年来,中国部分传统优势产业向东南亚转移明显。无论国际竞争还是国内循环畅通,都需要改善和优化国内营商环境及循环成本,这其中,降税已经迫在眉睫了。

假设2, 国内及国际市场双循环畅通运行必然要求降低税率差距,或促进税率逐步趋同。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越顺畅,越有利于扩大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越能促进更大范围的全球分工和融合,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既然要促进国内和国际要畅通区域要素自由流动,必然借助各种金融杠杆,如汇率杠杆,有序

推动跨境资金自由便利流动。这就需要我们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而拓放宽外资吸引调节机制。因此,双循环格局下,我们更应该吸引外资,利用一切资源促进我国贸易强国战略实现。因此,按照服务实体、风险可控、分步推进的原则,全方位开展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兑换是必然路径。

假设3, 双循环格局下,汇率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四、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合作概况

(一) 大湾区贸易概况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20年末总人口近7000万人,湾区生产总值超过11.4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以不足全国1%的土地面积和不足全国5%的人口,创造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已经步入全球经济的第一方阵,具有成为世界级湾区的经济条件。粤港澳大湾区源于一体的地缘条件、血浓于水的亲情人缘,多年来形成了紧密的经贸关系。比如20世纪80年代之后,港澳两地将劳动密集的生产工序转移至珠三角和其他地区,形成了粤港澳三地“前店后厂”式的贸易合作分工体系,形成了紧密的贸易链条,推动了珠三角地区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2017年开始,国家推进大湾区战略规划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合作一直在加强,贸易增长势头强劲,大湾区内部贸易规模在2019年已经达到11250.83亿元。粤港澳三地在彼此贸易格局中均占有重要地位,香港稳居广东省对外贸易第一贸易伙伴地位。在香港贸易格局中,广东稳稳位居第一。在对澳门贸易格局中,2019年广东首次超过香港,且增长势头迅猛。

粤港澳三地内部贸易有着较强的互补性,

贸易合作机会较多。在粤港贸易中,广东对香港主要出口机械电器设备,占比为70.31%。2020年,广东国际贸易进出口已经达到7.08万亿元,连续三年超过了7万亿元,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自1986年起,连续35年居全国首位。粤港澳内部贸易中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业内贸易,合作潜力较大。

(二) 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合作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之间贸易合作最大的优势就是同根同源的民族感情和一百多年来互通有无、相互帮助的贸易合作历史。

众所周知,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其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贸易,也可以说,是贸易造就了整个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正因为先有贸易,再有加工贸易,然后才形成了世界工厂。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就是要建成全球的贸易中心和贸易格局体系。具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贸易合作的优势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要港口通达能力强。大湾区诸多城市都是国际贸易的传统及现代港口。目前,有外贸航线660多条,连接世界港口1200多个,贸易吞吐量非常大。

二是经济实力强大。粤港澳大湾区GDP占全国12.5%以上,湾区内成熟的制造业与港澳发达的现代服务业结合,经济实力举世瞩目。

三是优质企业集聚度高。截至2020年,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大湾区有21家。从企业所分布的地区来看,8家上榜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其次是香港有7家,广州3家,佛山2家,珠海1家。

四是多元优势。在“一国两制”的特殊国情下,湾区的规则体系和政策制度将有效的衔接国内外市场,“一国”有利于强化内循环,“两制”则有利于对接外循环,这是世界其他湾区所没有的多元优势。

(三) 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合作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从贸易规模来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进出口贸易中,珠三角9市的规模比香港和澳门都要大得多。但是单就

城市而言,香港的进出口额远比大湾区其他城市要大。澳门由于其自身环境和发展条件的限制,其货物贸易规模相对较小。

二是贸易结构有待优化。大湾区贸易结构中存在着严重的短板,逆差大,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比较高。其中,香港、澳门和广州的第三产业所占市场份额较大,港澳两地的第三产业占比均高于90%,广州的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了70%,深圳的第三产业占比也有60%。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由于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逐步减弱,贸易结构有待优化。

三是贸易保护导致贸易风险。大湾区内许多核心技术或关键部件依赖进口。且频频遭受其他国家不公平制裁,难以实现生产所需原材料、零部件、关键设备及时供给,导致对外贸易风险剧增。另外,大湾区范围内贸易便利化、通关手续、相互认证等方面还没有完全解决,本质上是制度规则的创新不足,一旦遭遇外来冲

击,容易诱发贸易风险。

五、实证检验及结论分析

(一)变量的设计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粤港澳三地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

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粤港澳三地内部贸易额增长率为解释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主要有:

政府支出增长率 选取三地政府财政支出环比增长率。一般而言,政府财政支出在短时期通过乘数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影响。

汇率 本文选取三地各自本币和美元比值。一般而言,汇率越高,该地区的国际价格竞争优势就会被削弱,出口额减少。

税负 本文选取三地税收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一般而言,税负越高越能抑制经济增长。

表1 变量含义的预期效果

变量	含义	预期符号	理论说明
trade	区域内部贸易增长率	正	区域内部贸易额越高,经济增长越快
government	政府支出增长率	正	政府支出越大越能拉动经济增长
exchangerate	汇率(本币/美元)	负	汇率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
tax	税负	负	税负越高,投资越少,越不利经济增长

(二)模型设定和描述性统计

为了保证变量的平稳性,本文对上述变量取对数处理,建立了如下模型以验证粤港澳三地区域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ln GDP_t = \beta_0 + \beta_1 \ln trade_{it} + \phi X_{it} + \ta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i表示粤港澳三地,i(i=1,2,3),t表示

第t(t=2003,...2019)年,GDP表示本地生产总值,trade表示内部贸易额,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其中包括政府支出(government)、汇率(exchangerate)、税负(tax)。 τ_i 为固定效应, η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变量基本情况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容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dp	51	8.32	40	-0.02	15.44
trade	51	6.79	1.81	2.80	12.74
government	51	6.28	1.30	2.89	12.53
exchangerate	51	0.17	0.59	0.12	0.16
tax	51	6.75	1.62	2.35	14.10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香港政府统计处、澳门统计网。

(三)回归结果及解释

本文利用2003—2019年间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3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分析

	(1)	(2)	(3)	(4)	(5)	(6)
	lngdp	lngdp	lngdp	lngdp	lngdp	lngdp
Intrade	0.274*** (11.204)	1.227*** (4.871)	0.180* (1.093)	0.283 (1.553)	0.257*** (1.998)	0.273 (1.013)
Ingoverment			0.125*** (6.027)	0.080*** (5.152)	0.077*** (4.006)	0.092*** (3.091)
Inexchangerate			0.057* (1.905)	-0.107 (0.921)	-0.129 (0.417)	0.147* (1.607)
Intax			-0.116* (1.758)	-0.907*** (7.994)	-0.121 (1.208)	-0.089*** (6.225)
时间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常数项	0.528 (0.801)	0.975 (1.470)	0.627 (0.984)	1.054** (1.794)	8.997*** (7.008)	0.840 (0.549)
N	51	51	51	51	51	51
模型设定	FE	RE	FE	RE	FE	RE
R ²	0.647		0.952		0.994	
系数联合检验	88.017	79.22	111.24	501.46	94.28	620.19
F/Wald						
个体效应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Hausman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说明:1.括号里的是t值;2.***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3.“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RE”表示随机效应模型。4.由于随机效应模型使用GLS估计方法,故相应的模型中没有报告R²。5. Hausman 表示的是根据 Hausman 检验进行模型选择的结果。

序列(1)和(2)由于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下,内部贸易增长率对大湾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为正。序列(3)(4)(5)和序列(6)中加入三个控制变量,分析结果表明,不管控不控制时间效应,大湾区内部贸易对湾区经济增长贡献始终显著为正,分别为0.283、0.257、0.273。即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贸易每增长1%,其对湾区三地经济增长贡献率都超过了2%。这也符合大湾区的实际,一直以来港澳作为广东省的“后店”,其与广东的贸易带动了三地经济的快速增长。

控制变量中,政府支出对大湾区经济经济增长系数为正,但是不明显,基本上都低于1%。究其原因,只要源于大湾区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依赖政府投资推动的阶段,其市场主体更有活力。汇率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变量系数为-0.147,表示汇率上升1%,经济下滑1.47%。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湾区经济外向度过高,因而对汇率较为敏感。税负对经济增长影响为负,变量系数为-0.089,表示税负上升1%,经济下滑0.089%,小于1%。其原因主要在

于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较高,能有效抵消税收的负面效应。加上目前中国香港和澳门整体税负较低,也能拉平广东省的税负效应。

不难发现,以上研究结果充分印证了上述理论分析部分的假设1、假设2及假设3。以上分析,让我们坚信湾区经济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海湾及其身后的腹地,更多的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城市群。未来应该通过区域合作制度的完善,最大程度地发挥湾区的分工和协作效应,就一定能建成国际一流湾区,成为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和贸易中心,跻身世界知名城市群前列。

六、对策及建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国方针。作为我国双循环最理想的试验地和前哨,粤港澳大湾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统筹大湾区内外贸易关系。统筹均衡国内及国外、湾区内和湾区外贸易结构,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贸易对区域乃至全国经济突围的引领作用,加快完善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贸易的政策体系的形成,充分发挥区内和区外贸易的促进作用。经济双循环更侧重于内需的培育和开发,提高经济要素在国内的配置效率。就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其必须要依靠自身超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强大的区域内贸易体系,并以此来带动和优化贸易格局,从而建成我国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样本。目前,大湾区除了有香港、澳门两个自由港外,还有前海、南沙、横琴等自贸试验区片区,要发挥这些高水平开放平台作用,加快由“两头在外”转向“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围绕着向外和向内打通双向驱动战略。

二要扩大内需,大力发展湾区内贸易。内需是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合作的基石。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朝着高效和高质量的发展道路迈进,粤港澳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地区

资源。粤港澳三地有着规模庞大的内需市场、较为完善的工业品、消费品产业链,有能力建立内部产销一体化的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同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趋势的发展演进,可能进一步带动国民消费能力增强。随着湾区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的消费主体、消费结构势必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巨大的消费需求。粤港澳可以走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 展道路,借助省际贸易的繁荣以加强其内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更好地释放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

三要以科技创新提升内循环。无论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是产品质量在循环中的竞争。所以,要进一步发扬企业家精神,在创新和“工匠精神”方面狠下功夫。只有打造更多品牌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安全的高质量商品,才能更好地畅通内、外循环。粤港澳大湾区要利用好自身制造业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基础性优势,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要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一方面,通过创新来提高供应质量和供应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创造新产品、新服务等更高层次的供给,带动大湾区创新发展。特别是,随着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等的逐渐成型,创新要素加速流动,辐射带动区域的创新发展。

四要优化湾区内贸易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贸易中广泛存在着各种商品同构的现象,且多集中在机电产品上。双循环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应转向集约型与质量效益型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巩固原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优势的基础上,配合区域内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优化,促进大湾区内部均衡发展,形成区位差异化和一体化的贸易格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要按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4个环节,通过加快创新发展,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同时,要落实内地与香港、澳门CEPA系列协议,积极推进传统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技术贸易转变,大力发展保税物流、保税研发、保税维修、保税展示等新业态。

五要加快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融合的大背景下,基于海关环境、港口效率、电子商务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完善合作制度安排,根据三地社会发展和经济贸易的实际情况,探索建立具有互惠互利的贸易合作模式。减少和加强贸易流程业务的办理时间与沟通效率。通过签订互惠互利的贸易合作协议畅通贸易合作,促进贸易往来,不断提高粤港澳三地贸易合作水平。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利用国内市场走出价值链底部困境。在过去“以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国内市场被国外企业占领和控制,且也换不来真正的核心技术,长期被迫跟随。通过培育强大的国内市场“以市场培育、创新技术”,以质量需求动能,引导企业不断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升级。

参考文献:

[1]徐奇渊.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如何理解和构建[J]. 金融论坛, 2020(9): 3-9.

[2]刘元春. 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J]. 理论导报, 2020(10): 61-62.

[3]李源.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学理论探讨[J]. 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20(6): 101-102, 124.

[4]汤铎铎, 刘学良. 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J]. 经济研究, 2020(8): 4-23.

[5]陆岷峰. 构建新发展格局: 经济内循环的概念、特征、发展难点及实现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19-31.

[6]戴翔, 张二震.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J]. 经济学家, 2018(1): 70-78.

[7]刘志彪. 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新逻辑[J]. 探索与争鸣, 2020(7): 42-49.

[8]吕秀彬.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探析[J]. 新经济, 2020(10): 46-50.

[9]倪月菊. 从外贸依存度变化看强化“国内大循环”的意义防风险, 补短板[J]. 进出口经理人, 2020(9): 59-59.

[10]王洪涛, 陆铭. 供需平衡、动能转换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 江苏社会科学, 2020(4): 128-136.

[11]刘伟, 蔡志洲. 经济周期与长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和特点(1978-2018)[J]. 经济学动态, 2019(7): 20-36.

[12]李鹏. 全球分工体系下我国内外循环经济的转换[N]. 中国审计报, 2020-08-05 (4).

[13]沈坤荣, 赵倩. 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J]. 经济纵横, 2020(10): 18-25.

[14]汪伟全. 论我国地方应急合作的现状及其完善[J]. 理论探讨, 2016 (4): 150-154.

[15]许鲁光.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深化深港合作创新[J]. 开放导报, 2017(8): 32-36.

[16]毛艳华, 杨思维.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创新[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168-177.

[17]杨英.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视角的澳门经济建设思路[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24-31.

[18]黄丽华. 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引领珠三角湾区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J]. 探求, 2017(1): 39-44.

[19]宋周莺, 祝巧玲, 徐婧雅. 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竞合关系及其优化路径[J]. 地理研究, 2020(9): 2065-2080.

[20]袁持平, 刘洋. 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建立共同市场制度整合的效应研究[J]. 亚太经济, 2012(3): 131-136.

[21]封小云. 目前粤港澳经济合作的阶段性特点分析[J]. 港澳研究, 2016(3): 64-72, 95.

[22]李邨, 郑莎莉, 梁育填. 贸易促进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J]. 热带地理, 2017(6): 792-801.

[23]李彦, 汪玥.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粤港澳经贸深化合作与探讨[J]. 对外经贸实务, 2019(4): 9-12.

【责任编辑 许鲁光】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nder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WU Yida & DING Huanfeng

Abstrac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roposal to speed up the double circulation promoting each other is the refinement and sublima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rac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a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lso points out the road

and direction for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and the Great Bay area. Without cooperation, there will be no Bay area.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Bay area district has been deepening for many year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foreign trade, and remark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recently, too much reliance on export oriented strategy weakens the development kinetic energy. Whe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or economic strength,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Bay area district should become a model and experimental field for the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al cy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mong them, the trade cooperation among the three places in Bay area district should be vigorously promoted, so as to take the lead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encirclemen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demand contraction, supply impact and expected weakening” and drive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is, on the basis of simulating and analyz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reg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c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e cooperation in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Bay area, and then empirically tests the economic promotion effect of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bay area.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l trade growth rat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Bay area is always positive;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coefficient of Bay area district is positive, but not obvious; The exchange rat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coordinate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relations of Bay area District, expand the domestic demand of Bay area District, vigorously develop the intra Bay trade, enhance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ptimize the trade structure of Bay area District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trade integration and other policy suggestions on further promoting trade cooperation.

Keywords: double circulati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rade cooperation; effect test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载体发展评价 及其技术创新效应*

刘 胜¹ 谢嘉怡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2.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 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载体建设对集聚创新资源要素、推进科技创新活动的作用愈发凸显, 但当前学界对创新载体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为此, 本文综合运用熵值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及北上杭等重点城市的创新载体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评价, 并实证考察了城市创新载体发展对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 在样本期间内, 各城市创新载体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 但不同城市间的创新载体发展水平反映出显著的时空差异特征。此外, 城市创新载体发展水平与创新主体空间集聚度、产业发展水平、地方公共服务体系等城市综合实力因素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 城市创新载体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而具体从创新载体发展的细分维度来看, 相较知识技术的转化能力和应用能力, 基础研究能力提高对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了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在“十四五”发展新阶段下, 应加快促进创新载体空间布局优化和动态匹配, 因地制宜发挥创新载体的区域辐射带动作用, 健全城市之间创新载体的沟通协作联动机制,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载体集聚区建设提质增效, 进一步深化跨区域科技和产业融合合作,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释放新活力。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载体 产业技术创新 熵值法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2)03-0027-11

一、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挖经济发展新优势正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但不容乐观的是, 在中美科技摩擦和“逆全

球化”背景下, 我国企业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技术封锁或创新壁垒。由此, 亟需充分整合和发挥现有各类创新平台载体的优势, 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加大对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 从而全方位促进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及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近年来, 我国

收稿日期: 2021-10-12; 修回日期: 2020-04-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2102197003);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9A1515011581); 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pdjh2021b0179)

作者简介: 刘胜(通讯作者),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谢嘉怡, 研究助理, 本科生, 主要从事城市科技创新研究。